

编者序

李慧玲

杨荣文先生1988年从政加入人民行动党参加是年的大选。《联合早报》当时报道，行动党介绍33岁的杨先生为候选人时，标题直接引述杨先生的话：“我要继续像个年轻人”。文内一开头就概括杨荣文在记者会上表达的意愿：“作一位能反映真实的自我和与年轻人认同的议员，是杨荣文准将的理想。”

刚出道的杨先生对记者谈到政府的作风，以及它和年轻人之间的距离。他当时说，一些年轻的新加坡人，特别是受了较高深教育的那些，对政府存有怀疑。他和年轻的同僚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赢得这些年轻新加坡人的信任，消弭他们和政府之间的距离。

《海峡时报》则突出杨先生重视培养新加坡人的归属感和对国家的荣耀与认同感，但在为新加坡感到骄傲的同时，又不至于变得自大，沦为狭隘与小格局的国家主义。

那是1988年。今天当我们省视新加坡的现状，再回看当年杨先生对记者说的话——不论是看华文报或英文报突出的重点，他所提出的至今仍没有过时。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四分之一世纪并不是很长的岁月。而年轻的国家这些年仍在思索同一主题——新加坡的生存之道与人民的身份认同问题，这应该是国家发展的正常过程；另一方面，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对一个人来说，肯定是不短的经历。杨先生的思考，并不是在他从政之后才开始。他在学生时代，在1970年代东南

亚地区的起伏、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之际，和其他进步青年一样受到当时的思潮影响，关注时局，参与示威。他在剑桥时期是新马同学会的会长，所保存的学生时代的随想笔记，反映的正是知识青年对时事思考的轨迹。

但是与很多思想者不同的是，在政坛的23年里，杨先生的思考型政治人物形象既让他在行动党第二与第三代政治领袖主掌的内阁中显得与众不同，内阁部长的身份与权力也使他得以将思想付诸实行，直接主导国家政策与方向。阅读杨先生的言论，在今天社会开放、资讯发达的年代，他的一些说法似乎看来平平无奇，甚至可能让人觉得趋于保守；一些他所倡导的概念，经过这些年已经融为新加坡经营战略的一部分，看起来已经不怎么新鲜与醒目。但是端详他发表言论的日期，对照当时的背景，就会明白他的新进。我们可以看到，从1980年代末到2011年之间，新加坡的环境和文化，如何让一个有政治谋略和眼光的思想者，找到落实的平台；而他的概念形成政策时，如何改变人们今天在新加坡的生活素质。

杨先生在1991年受刚接任总理的吴作栋先生委任，担任新闻及通讯艺术部代部长。那是新加坡经历了李光耀先生担任总理31年，第二代领导人接棒之初，也是新加坡经济条件较好，人均收入在亚洲已紧追香港，超越台湾和韩国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位年轻领袖并不是过多地对新加坡自我褒扬，而是在言论中透露出新一代领导人在经济领域之外，对新加坡建国后的表现和性格，以及长远未来路向具有深刻反思的精神。这与他1988年成为候选人时所表现的一致。上任不久，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会的一场代表性演讲，把一个词带入了当时的政治论述里——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在新加坡不是一个新的形态，但是在1990年代初，社会对这个概念的探讨有限，如果有，也只是停留在知识界。杨荣文的演讲不是蜻蜓点水，而是阐述了一套完整的理念，相信已经思索一段时间。在谈到公民社会空间的重要时，他说：

我还想谈谈社群之间的互助与新加坡灵魂。公民机构要成长，政府必须适当退出，为基层活动留出更大空间。如果政府大包大揽，插手干涉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结果必定不堪。所有人都会沦为酒店的住客。共产主义，尤其是苏维埃共产主义，僭取一切权力，建立了一套无良的制度。这个制度，让人人依附于国家，于是也毁灭了群体灵魂。

对于国家/政府（State）和公民社会的关系，他把新加坡比喻为一棵榕树：

现在的问题，是榕树底下寸草不生。国家机构无处不在，民间组织难以繁荣。所以必须修剪枝榕树叶，腾出空间，让其它植物生长。大家知道香港朋友怎么说我们吗？他们说，我们照顾人民无微不至，人民变得软弱了。

公民生活是公众情感和社会灵魂的源泉。公民生活是民主国家的粘合剂。我们必须自己动手。政府可以协助，但不能自上而下构建公民生活。

……我还想说，集权与放权间，要有适当平衡。为榕树修剪枝叶是必然之举，却不可将树连根拔起。新加坡始终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心，以迅速应对时刻变化的竞争环境。新加坡需要多元性，但不可过量，否则过犹不及。换言之，修剪时要小心翼翼。

谁来修剪榕树？从当时的形势看来，似乎只有榕树能够自我修剪。杨先生的言论在新加坡讲英语的公民社会得到回响，这篇演讲成为提到他时必然会被引述的经典之作。不过，执政党内部对于这篇演讲有何直接反应的信息，我们并不清楚。

对于新加坡，杨先生提出超越疆域限制的想象。他中选进入国会并入阁后，多次在言论中谈新加坡内在调整的需要，以及外部发展的可能性。在他的思维里，新加坡与世界密不可分。他指的并不是行动党老一代领导人解释的，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要跨越本区

域其它经济体，直接同欧美世界衔接。杨先生提出的，是以世界为新加坡腹地的概念，拓宽新加坡的格局。在他的思维里，新加坡与世界密不可分，经济、技术与文化密不可分，过去与现在密不可分。在新加坡国内，不论是跟学生，还是一般新加坡公众，他的言论必然要将新加坡放置于世界形势之内：国际化、第二双翅膀，绝对不落入内视与狭隘的视角。他认为新加坡需要向外发展经济，新加坡人游走世界时身份清晰，对内保持团结，在外与各国广结良缘，并且善用新加坡同亚洲其他地区的文化联系，维持同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印度的文化渊源。

至于新加坡在寻找共同的身份认同期间，族群之间不时会出现的紧张关系，杨先生处之泰然。他不着眼于族群对立的问题，而是用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突出他们之间的差异对新加坡的价值。2001年当他担任贸工部长，为中央医院讲坛发表演讲时说：

我们必须知道造就今日我们之缘由。如果对自身的历史步履一无所知，便不知道何去何从……各种矛盾，不一而足。没有这些矛盾，我们就无法继续海纳百川，也无法维持与世界的联系。

他继而谈到创造“大新加坡”思维的重要性。“这里说的新加坡人，可能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亚欧混血儿，但都要有大智慧、大胸怀。他心目中的新加坡，不仅是地理概念上的岛国，而且还要考虑新加坡的亚洲和盎格鲁萨克逊历史渊源和背景。想想加入新加坡籍的中国或印度移民。”

我们必须用这种着眼大局的思想指针来教育子女。这就是“小新加坡”意识与“大新加坡”心态之区别。“小新加坡”意识，对本地区的各种问题，会觉得不自在，也认为我们的多元化，是摩擦和烦燥的根源。“大新加坡”心态则与地区的情况水乳交融，还会弘扬我们的多元化，并以之为通往全世界经济和文化空间的渠道。如

果以这种心态抚育后代，整个世界都会是他们的，别人会向往与他们同道，以他们为楷模。

今天当新加坡人更专注于关心个人的事情及新加坡内部的情况，这番十几年前发表的言论，能给予我们什么价值和启发？

杨先生的言论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文化相关。1990年在马来语月的开幕仪式上，他谈马来语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并且提出文学作品的翻译，能够让使用不同语言的新加坡人了解彼此的文化。他谈新加坡的华人文化，是将它放置在世界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趋势的框架底下；从政不久，无论是晚晴园的保留，或者华校生和南大生的身份问题，新加坡的华文水平问题，他的关注，也是在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当中少有的。而杨先生在这方面的言论虽然主要以英语发表，但他看待课题的深度和观点，使他与讲华语社群之间建立一份特殊的关系。

编选杨先生的言论集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我从近千篇言论中筛选了几轮，好些文章难以取舍。从阅读的角度来说，除了大块头的演讲之外，他到一些邻里学校的演讲，触及的课题，表述的方式，让人感觉清新。一些社区的活动，他在平易的讲话中，仍设法给听众留下一些思考点。例如他在1992年到仰光中学的25周年校庆演讲，谆谆善诱地跟学生谈的是“平等”和“诚恳”的概念：

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人的不同，与此同时又平等对待他们。换个方式来说，我们要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友情跟能够被制造与打碎的物件不一样。我们得要对彼此怀有感情，包括对我们的家长、兄弟姐妹、朋友。我们要做正确的事，不去做错误的事，这并不是因为有人在监视我们，而是我们由衷感到应该这么做。每个人都会维护尊严，有强烈的自尊。是的，在新加坡我们竞争很激烈，我们竞争，为在学校争取优异表现，为考上理工学院或初级学院，为求职，为地位，为钱。竞争带出我们最好的一面，但也可能会带出最坏的一面。因此，竞争必须有限度。我们的竞争意识必须受到合作与同情心的

调节。我们是人，得有人心人情。我们不是机器。每个人都有存在于此，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的权利，但是每个人对其他人也有义务。我们要把握生命，活得有意义。

1993年，他为高岛屋在义安城的商场主持开幕时，谈的是商业与文化的相互依存，并更进一步去谈文化对社会的重要性：

我们真正关心的不是物质，而是人民的思维。迈入新的世界，固然要精通科学和数学，但远不足够。我们还要有艺术感。科学和数学使生产准确高效，但要创造高价值，只能靠艺术元素。比如忍者神龟玩具。制作精良，符合发达国家的质量安全和标准不在话下，但可由中国工人在适当的监督下生产。忍者神龟的价值不在实体产品的生产，而在其概念、设计和营销手段。

数理强并不够，需要人文艺术的调和，是他在忍者神龟里看到的价值。从这里延伸开去，他的立场很明确：

智力发展和艺术发展，好比中国思想中的“阴”和“阳”。平衡是根本。古代学官在官场中倡导儒家思想，私下却倡导道家思想。日本的禅宗思想与追求卓越不可分割。越是要“阳”，就越是要“阴”。因此，经济发展要更好，文化发展也要更好。

这类观点在2014年或许算不了什么，但是20年前新上任的部长有这样的视野，愈发显得可贵，让民间对新加坡的人文环境有所期待。而也正因为他有可以施展的政治舞台，在执掌新闻及艺术部的年月里，他形塑了新加坡不同的文化景观，影响深远。他的贡献不纯粹是保留了更多的旧建筑，把它们翻修成美术馆、博物馆或作其他用途；不纯粹是他战略性地吸引了外国媒体公司把区域总部搬到新加坡来，或者支持本地电影的拍摄。杨先生真正的贡献，在于他作为部长，处

理文化、历史政策时的眼光与态度，没有让文化从属于经济发展的信念，以及对民间社会的开放与尊重。

1996年杨先生以行动党青年团主席的身份，率领团员到美国考察交流，了解美国总统初选的情况。行程中，他特别选择到犹他州，希望以此提醒行动党员不要只是片面地以为洛杉矶及纽约就是美国的全部。我当时入行做记者两年，接到报馆委派随行观察与采访的任务，有三件和杨先生有关的事让我至今不忘。第一件是我们到犹他州的盐湖城访问时，当地市长很希望我们采访她，在新加坡为盐湖城宣传。因为盐湖城与我们距离遥远，我工作的《联合早报》读者当中有多少对到盐湖城旅游投资感兴趣，我没有把握。记得当时杨先生走过来跟我们几个随行记者说：办得到，才好答应人家。如果不适合，就坦白告诉那位市长，不要敷衍人家；第二件，是当时因为李登辉访问美国，中美关系紧张。同样是在盐城湖，他在与盐城湖市长为他设的晚宴上演讲40分钟，即兴发言，稿在腹中，触及中美之间交往的历史与矛盾，侃侃而谈，是平日积累思考的呈现；第三件，是到华盛顿时，除了到纪念美国第三任总统、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纪念堂之外，杨先生特意要求安排到位于弗吉尼亚中部的杰弗逊故居蒙蒂塞洛（Monticello）参观。杰弗逊的故居建筑切实如何不是重点，关键在探寻历史的经验。这三件事，颇能让人对他的知识眼界、性情志趣、行事风格，有所领会。

这本言论集可以从学理性较强的时政评论视角来阅读，但事实是，因为杨先生确实曾经从政坛新星，到成为内阁中重要的一员，并且先后担任过新闻及艺术部、卫生部、贸工部与外交部的部长，因此，比照言论与新加坡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变化，包括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或许可以读出哲学之外的趣味。理想上应是才能多元的内阁，在他离开后有何种缺失，或许要资深阁员才知道。但是在世界面临变局，新加坡社会随之进入又一次转型，公民社会的力量亟待迸发时，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很难不去猜想如果杨先生仍未退场，身在其中，会是怎样的思考，榕树会有怎样的状貌。